

清代《合州志》编纂述论

高 宏

提 要：清代是历史上地方志编纂的最高峰，合州地区先后6次编纂《合州志》，最终刊刻出版3部。在地方政府官吏的主导下，清代系列《合州志》质量上乘，志书内容丰富，体例精良，编纂规范，既是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也为当代地方志编纂提供诸多借鉴。

关键词：清代 《合州志》 编纂 述论

合州，古地名，治所在今重庆合川，宋淳祐三年（1243）筑钓鱼城抗蒙为世人所熟知。春秋战国时，隶属于巴郡，公元前314年，置垫江县^①。而合州作为地名，始于西魏时期，“即垫江县治置垫江郡，以涪汉二水合，更名合州”^②。合州之名始现。自西魏开始，合州作为地名，时间长达数百年，但数次被更替，“开皇末改曰涪州”^③；“武德元年，改为合州，领石镜、汉初、赤水三县。三年，又置新明县。天宝元年，改为巴川郡。乾元元年，复为合州”^④；“淳祐三年，移州治于钓鱼山”^⑤。元末，“明玉珍省县入焉”^⑥，国号夏。明洪武四年（1371），归附。仍为合州，隶重庆府。有清一代，合州一直沿用，行政区划有所调整，“康熙元年，省铜梁、安居入合州，省璧山入永川，省武隆入涪州。八年，省定远入合州。六十年，复置铜梁，以安居并入。雍正六年，复置大足、璧山、定远三县”^⑦。到雍正六年（1728），合州成为不再辖县的单州，隶属于重庆府。

合州历史上有修志的传统，曾先后9次编修《合州志》，这是比较罕见的。据相关考证，第一部《合州志》是宋代嘉定六年（1213）任逢主编，该志共30卷42篇，已失传，部分内容散见于其他志中。明代先后两次编修，弘治十六年（1503）《合州志》失传，内容已无从考证；万历七年（1579）刘芳声、田九垓再次编修，书成，8卷近10万字，现藏于日本内阁文科。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修志的一个高峰期，在合州也不例外，先后有6次准备修志，但真正意义上只有4次进行了编修。康熙十一年（1672），孙国衡开清代编修《合州志》的先河，但其编纂的《合州志》，只存手稿30页，现藏北京图书馆；乾隆年间，前后3次续修合州志，在乾隆初年，许元基对旧本《合州志》手抄，不是真正意义的编修，该本现藏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随后，乾隆十三年（1748），宋锦、刘桐编修完成8卷10万字左右的《合州志》，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乾隆

① 垫江，原为褒江，取嘉、涪二江在城北鸭咀的汇合之水如衣重叠之意，《汉书·地理志》误记为垫江并沿袭至今。《汉书·地理志》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白水，刚氏道，涪水出徼外，南至垫江入汉，过郡二，行千六十九里，阴平道。”《汉书·地理志》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956页。

② 周澄修：《合州志》卷3《职方》，嘉庆八年（1803）刻本。

③ 《隋书》卷29《地理上》，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919页。

④ 《旧唐书》卷39《地理二》，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090页。

⑤ 《宋史》卷89《地理五》，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2219页。

⑥ 《明史》卷43《地理五》，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032页。

⑦ 《清史稿》卷69《地理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2212页。

四十七年王汝嘉开始重修《合州志》，后王汝嘉病逝，仅成《凡例》9则，篇目12条；乾隆五十三年周澄、张乃浮在王汝嘉拟定的《凡例》基础上，续修《合州志》，共16卷近15万言，乾隆五十四年刊刻出版，现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光绪四年（1878）费兆铨、程业修再修《合州志》，共16卷25万字，现藏于重庆市图书馆。清代《合州志》虽先后6次编修，但最终仅刊印出版3次，其余或未成书，或散逸不成体系。本文拟对清代历次《合州志》予以梳理，管窥其编纂之法，以供当代修志参考。

一 清代《合州志》的编纂人员

清朝统治者确立其在全国的统治之后，迫切需要了解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诸方面的情况，开展了《皇舆全览图》《内府舆图》《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一统志》等大型文化工程。特别是编修《大清一统志》，清庭多次下诏督促全国各地编修省、府、州、县志，使中国地方志的编纂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官修方志，政府主导，是清代修志的一大特色，清代《合州志》的编纂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康熙十一年《合州志》由孙国衡编修。孙国衡，字我白，江西上元县人，康熙八年（1669）任合州知州，离任时间不详，但该志是在其主政期间编修。乾隆十三年《合州志》的编修，是在重庆府和合州两级地方主官的推动下进行的。重庆府太守林兴泗入主重庆后，深感修志的必要性，曾言：“乙丑冬，余奉简命来守渝州，其疆域则延袤辽廓。民俗则纷杂浇漓，且流寓较多，而土著少，人心散而好尚异，如从暗室索照，欲搜阅郡志以求梗概，蔑如也。爰是周谘博访于故老绅士中，仅得抄本数卷，断简残编什存三四。退食之暇，每思搜罗成集，而稗官野史，竟同杞宋之无征，甚可虑也。况各属之版图、户籍、阨塞津要及人物之足为矜式，确可流传者，又非可以悬揣臆度。”^①林兴泗的主张与合州刺史宋锦不谋而合，“合州刺史宋君与余有同心”。乾隆十二年（1747），宋锦开始组织编修。林兴泗不仅仅倡导修志，还身体力行，广泛收集资料，“莅任甫载余，将平日所采辑编次者，出以示余，意欲检校损益以求大备”。但由于宋父过世，宋锦按制回籍丁忧，书未成。乾隆十三年四月，刘桐继任知州，继续其事。刘桐上任后，也认为要利用纂修一统志的契机，编修郡县之志。“岁乙酉，世宗宪皇帝特命儒臣纂修一统志，因敕直省以通志进，郡邑皆得以志呈。於戏，休哉，此非征文考献之一机乎！”^②在府州两级官员的推动下，乾隆十三年《合州志》得以成功编修，并刊印。乾隆五十四年《合州志》的续修也得益于两任知州的主导。乾隆五十三年，知州左修绪在任时就准备续修，“左公修绪谋举废坠兼及于志，属邑人刘君世仪谘访遗漏，敦请安居太史王公汝嘉总其事”^③。但后来左修绪离任和王汝嘉作古，未勒成书，仅成《凡例》9则篇目12条。周澄上任之后，欲验盛衰、知沿革，翻阅旧乘，发现有所缺失。“盖《合志》久湮无考。乾隆十三年，前牧宋公锦搜集散失，继任刘公桐参订付梓，迄今越四十年。生齿日繁，户口日增，江汉炳灵，每多杰出。不重为搜罗补辑，旧闻则略焉。”^④周深感“弗备，是貽守土者羞”，于是组织人手，着手修志，任命张乃浮为总修，在王汝嘉拟定的提纲基础上续修《合州志》。

另外，4部《合州志》的编纂人员，官修痕迹也彰显无遗。以乾隆十三年《合州志》的参

① 刘桐纂：《合州志》，林兴泗“序”，乾隆十三年刻本。

② 刘桐纂：《合州志》，刘桐“序”，乾隆十三年刻本。

③ 周澄修：《合州志》，周澄“序”，嘉庆八年刻本。

④ 周澄修：《合州志》，周澄“序”，嘉庆八年刻本。

修人员为例，其参校人员涉及四川辛酉（1741）科举人何良臣、合州学廩膳生员谭玉书、合州学生员董枢；督梓包括重庆府合州吏目邓作璫、重庆府儒学岁贡董汉文、合州学廩膳生员苟企达、合州学生员程明述等，这些人员基本都领取朝廷俸禄，属于国家政府人员序列。光绪四年《合州志》的编纂也吸收了合州学正、在籍吏部文选司主事、邑恩贡生、邑岁贡生、邑廩膳生、邑增广生、吏书等广泛参与其中（见表1）。

表 1 清代《合州志》的编纂人员

地方志	分工	人员
康熙十一年《合州志》	编纂	合州知州孙国衡
乾隆十三年《合州志》	纂修	四川重庆府合州知州宋锦、重庆府合州知州事刘桐
	参校	四川辛酉科举人何良臣、合州学廩膳生员谭玉书、合州学生员董枢
	督梓	重庆府合州吏目邓作璫、重庆府儒学岁贡董汉文、合州学廩膳生员苟企达、合州学生员程明述
乾隆五十四年《合州志》	纂修	合州知州周澄
	始修	文渊阁校理翰林院检讨王汝嘉
	总修	癸卯科举人张乃浮
	篆字	癸卯科举人彭世仪
	采访	广东钦州吏目刘世仪、廩生刘泰三
	督梓	河南鄆城县典史韩文星、监生李文生
	绘图	布衣张珩
	校字	郡学生员：王应庚、李廷谏、贾志昂、黄肇琮，童生：金锡爵、杨葛青
光绪四年《合州志》	总理	合州知州费兆铖
	协理	合州学正王秉三、合州训导陈绍业
	编辑	在籍吏部文选司主事程业修
	分纂	邑恩贡生蔡新周、邑岁贡生龙在田、邑廩膳生杜鸿宾、邑增广生彭光昫
	写校	邑廩膳生萧慰祖、陈东阳，邑附学生苟鍾禄、杜庭桂
	绘图	吏书龙文翔
	五里采访	30 人

二 清代《合州志》的内容书写

清代所编修的4部《合州志》，贯穿大半个清王朝，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清代合州各个历史时期的全貌，重修和续修时不断进行增补，随时间予以延续。4部志书的资料相互映衬，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康熙十一年《合州志》是一部内容简略的手稿，资料出处不详。乾隆十三年《合州志》“创修无考旧志”，是在孝廉邹珩历经数载所修80余页残稿的基础上，由州牧宋锦“参订所成”，刘桐“监修付梓”，其资料主体是邹珩的未成书稿，只是进行了补阙和正讹。乾隆五十四年和光绪四年《合州志》内容相似度较高，非常注重资料的收集，资料来源丰富，天文、庙坛、官师等资料的出处在《凡例》中进行了说明，主要出自于各种古籍文献，包括《史记》《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华阳国志》《资治通鉴》《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以及《会典》和《实录》；同时，也注意对旧志的利用，在正文中取材于旧志的内容有的还予以注明，主要源于《垫江志》、万历《合州志》、雍正《四川通志》、乾隆十三年《合州志》等。

重修和续修的《合州志》，在内容上，不仅同类子目增加新的内容，而且还增加新的类目。尤其是光绪四年《合州志》增加“义举”“渡船”等社会救济类目，在“贼侵”“祥异”“城池”“古墓”“进士”“恤政”中，增加道光、咸丰年间的条目，使相关内容更为完整。在内容上还可以看出历史时期前后一些变化，诸如对“街市”的记载中，光绪四年《合州志》中“来苏里”记述的内容是源自前志“永清里”记述内容。将“永清里”一分为二，分为来苏里和永清里，体现了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4部志书在内容记载上有一定的重合度和沿袭，但编纂者从历史时期的实际出发又各有侧重，内容各有特色，在书写上各有千秋。

表2 清代《合州志》的内容

志书	内容	卷数
康熙十一年 《合州志》	古迹、碑记、城池、儒学、山水、寺观、孝义、烈女、名臣、人物、祠祀、艺文等	
乾隆十三年《合州志》	州全图、州治图、学官图、州署图、天文、地理、建置、秩官、学校、选举、人物、赋役、物产、风俗、艺文、图籍、杂著、外纪等	8卷
乾隆五十四年《合州志》	图考、象纬、职方、建制、食货、学校、典礼、风俗、官师、人物、选举、艺文等	16卷
光绪四年《合州志》	图考、象纬、职方、建制、食货、学校、典礼、风俗、官师、人物、选举、艺文等	16卷

康熙十一年《合州志》未成书，仅存30页手稿，内容极其简略，记载合州古迹、城池、儒学、寺观、孝义、烈女、名臣、祠祀、艺文等。以合州寺观为例，记述寺观六座，除嘉福寺相对

有较多文字记述之外,其余寺庙寥寥数字,信息极少。“嘉福寺,治东,元至元中建,明洪武中增修后贼毁。大清顺治十八年,重建;龙游寺,治东,俱毁。净果寺,治南,俱毁。濮岩寺,治西;方溪寺,治西,俱毁。鳌游观,治东。”^①该志内容之间也缺乏逻辑联系,“孝义”“烈女”“名臣”“人物”4个部分均是记述人物,从内容归属看,“孝义”“烈女”“名臣”都应该归类于“人物”范畴,本是从属关系,但志中4个部分是并列关系。从内容的记述来看,也存在语焉不详的状况。对合州人物的记述,十数人,明代居多,其他朝代较少,汉唐时期均予以注明可考,其余有些则无从考证。康熙十一年《合州志》从内容设置上看,更像是一本不完备的州志编写提纲,体例残缺不全。虽然如此,却不失珍贵。首先,该志开清代《合州志》之首创,是乾隆、光绪两朝三志之基础。其次,该志虽然极其简略,但记载的内容却真实可信,为后来方志的编写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在艺文中收录了邹智《钦崇天道疏》《回天变疏》《跋钓鱼城志后》及孙樵《龙多山记》,实属难能可贵。

乾隆十三年《合州志》8卷,包括天文、地理、建设、秩官、学校、选举、人物、赋役、物产、风俗、艺文11分志,另有图籍、杂著、外纪。卷首置州全图、州治图、学官图、州署图5幅图。在该志中,尤其是祀典、礼乐、科贡、赋役内容丰富翔实,是研究古代合州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第4卷“学校志”设置学宫、庙号、祀典、礼乐、名宦、贤、忠义、坛祠、教条、学田、义学、宾饮、书籍14子目。其中祀典记述极为详尽,从文庙正殿到两庑从祀都有完整的记载,对四配、十二哲、先贤七十八位、先儒四十五位,在所附的陈设图中一一列举予以说明,并对四配、十二哲、东庑先贤、西庑先贤、东庑先儒、西庑先儒、崇圣祠先贤先儒姓氏进行考证。祀典中两庑的陈设摆放记述尤为清晰:

东庑共祭十五坛,西庑共祭十五坛。此一坛式,每坛四位共一桌,于中间另共总设一小几,置奠帛、香烛于上。每桌用爵四,至行礼时,执事者注酒于爵内,分献官另献一爵于小几中。簠一,簋一,左边四,右边四,酒樽一。每庑用豕一,解为六十一方,如先贤先儒之数。每分用方木磬盛置于案,或用整猪公祭每庑,帛各一。^②

在礼乐方面,反映了明代合州地区礼乐变迁。

礼乐,按明初祀典,因前代用王礼。成化十二年,加边豆舞佾之数,祭以天子之礼。嘉靖九年,改定礼制,边豆格捐其四,舞以羽箭,用六佾,遂永为定式。春秋仲月上丁,以正印官为献官,佐贰教官为分献官。^③

并且,对礼乐中所使用的祭器、乐器、舞器,以及参与人数完整地予以展现。

祭器:祝板一、爵大小一百六十三、登一、钶二十二、簠五十六、簋五十六、边二百零六、豆二百零六、酒樽卓五上凿三孔、木磬大小五十三、香案十八、牲匣三香炉四十六、烛台四十六双、供桌四十六、毛血盆、痊毛血碟、蛻巾、盥洗盆架、酒勺五、冪

① 孙国衡纂:康熙《合州志·合州寺观》,康熙十一年手抄本。

② 刘桐纂:《合州志》卷4《学校志》,乾隆十三年刻本。

③ 刘桐纂:《合州志》卷4《学校志》,乾隆十三年刻本。

巾五、涤牲桶八、锅八、机盆四、庭燎节用；乐器：麾帽一、祝一、敔一、琴六、瑟二、钟十六、磬十六、埙二、篪二、箫四、凤箫二、笙六、横笛六、搏拊鼓二、歌工六人；舞器：用舞笙节二、龠三十六、翟三十六。以上共用乐生四十二人、舞生三十六人。^①

课税方面，记载了乾隆年间合州地区盐税征收情况，涉及盐井开凿和食盐的销售两个方面的税收。

灶户报开盐井二口。乾隆八年起科，每井榷课银三钱，课羨银三分六厘，共银六钱七分二厘。本州食盐额销蓬溪县，水引四十张，每张征正税银三两四钱零五九厘，羨余银四两四钱六分，截角银六钱。又销射洪县水引二百五十七张，每张征正税银三两四钱零五厘，羨余银四两四钱六分，截角银六钱。共银二千六百二十五两九钱。乾隆八年，灶户新增陆引二十三张，每张征正税银二两七分二厘四毫，羨余银一钱二分七厘，截角银四分八厘，共银十两二钱九分零二毫，在本井配销。^②

税目、税额及变化情况、食盐流通去向都较为清楚，是研究清代经济史的重要史料。乾隆十三年《合州志》门类齐全，体例详备，图文并茂，乾隆五十四年版本和光绪四年皆以此为范本，予以增减完善。

乾隆五十四年《合州志》是在乾隆十三年版本基础上重修的，修于乾隆五十三年，刊刻于乾隆五十四年，嘉庆八年进行增补。该志共16卷，包括图考、象纬、职方、建制、食货、学校、典礼、风俗、官师、人物、选举、艺文等部分，分门别类，体例详备，图文并茂，内容翔实。尤其在图考、艺文、选举方面较之前志更为翔实完善。该志更是光绪四年版本的母本，在乾隆十三年版本和光绪四年版本中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在图的运用方面，乾隆五十四年《合州志》数量大大增加。乾隆十三年《合州志》设置5幅图，而该版本图增加了12幅，达到了17幅之多，并且内容更加丰富，包括星野图2幅、疆域图1幅、城垣图1幅、文庙图1幅、州署图1幅、八景图8幅、临福祠1幅、武庙图1幅、万寿宫1幅。其次，在艺文方面，设置了5卷，篇幅较大，包括记、论、序、跋、疏、传、赋、铭颂、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俳律、杂文、杂录17种体裁。最后，选举卷，设置进士、举人、贡生、国子监、杂选、仕进、武进士、武举、封赠9个子目，宋天禧年间到清乾隆时期数百名通过选举入宦于朝或他省的合州人物一一记录在册。

光绪四年《合州志》是历代《合州志》集大成者，体例沿袭并对乾隆五十四年版本，内容进行了补充，全志总字数达到25万之多。增补内容主要集中于艺文、烈女、选举部分。在该志中，艺文部分收录较多，其份额占整部志书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人物卷设置12个子目，包括明贤、忠孝、武功、寿民、寿妇、忠节、节孝、仙释、流寓、义士、隐逸、孝妇等，子目较之乾隆五十四年本大为增多。实际上，乾隆五十四年人物卷较之乾隆十三年人物志内容就增加颇多，其中节孝收录80余人。而光绪四年人物卷比乾隆五十四年又有所增加，主要体现在节孝部分，尤

① 刘桐纂：《合州志》卷4《学校志》，乾隆十三年刻本。

② 刘桐纂：《合州志》卷6《赋役志·物产志·风俗志》，乾隆十三年刻本。

其是烈女子目烈女人志达千人之多。在选举卷，光绪四年本对前志内容进行了延伸，对乾隆至光绪年间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人数也大大增加（见表3）。

表 3 光绪四年《合州志·人物卷》内容①

子目	内容	备注
明贤	汉：6 人、唐：1 人、宋：3 人，明：15 人，清：24 人	
忠孝	唐：1 人、明：12 人、清代：27 人	
武功	汉：1 人、五代：1 人、宋：2 人、明：4 人、清代：14 人	
寿民	7 人	
寿妇	18 人	
忠节	记载剿匪、防堵要隘等死亡数百名之多	
节孝	明：10 人、清：千人之多	
仙释	汉：1 人、晋：1 人、唐：5 人、宋：4 人、明：1 人	
流寓	宋：2 人、清朝：2 人	
义士	13 人	
隐逸	汉：1 人、唐：1 人、宋：1 人、明：2 人	
孝妇	8 人	

三 清代《合州志》体例

纵观清代所修四部合州志，康熙十一年《合州志》不仅内容简单，体例也残缺不全。乾隆十三年重修《合州志》采用纲目体，乾隆五十四年和光绪四年两部续修《合州志》，沿袭前志体例，先列大纲，纲下细分子目。而且续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上高度一致，只是在细目上略作调整。

乾隆十三年《合州志》卷首置序、凡例、修志姓氏、目录、州全图、州治图、学宫图、州署图，随后分天文、地理、建置、秩官、学校、选举、人物、赋役、物产、风俗、艺文、图籍、杂著、外纪等 14 类 68 目。子目的设置有相应标准，以建置为例，建置下设公署、城池、驿传、铺舍、塘汛、坊市、里、津渡、桥梁、救生船、坛祠、寺观、养济院、漏泽、园附 15 目。究其归类原则，“公署、城池，以及桥梁、津渡，皆志乘所必及。至于铺递以通申檄，塘汛以查奸宄，救生船以振行旅，养济院以周残废，俱王政之大者，逐一胪列，

① 根据费兆铨、程业修纂光绪《合州志》卷 10《人物》整理。

以昭体制”^①。

乾隆五十四年和光绪四年两部续修的《合州志》按照王汝嘉拟定的《凡例》予以编纂。乾隆五十三年，聘请安居太史王汝嘉总其事，续修合州志，他认为前志“或详或略，体例纲目尚未谨严”^②。着手此事之后，他首先进行提纲的拟定。“一志分卷十二，纲各厘以目，每卷冠小引于篇首。其目条分缕晰，大者特按细者分注。或缀以论，或系以辩，总以考其源流，指其利弊，期于晓畅大义，览者因一邑而古今可参，颠末悉贯。旧志可采者仍录之，不敢师心自是也。”^③ 因王汝嘉作古，续修未遂，但其修志的原则，为续修所遵循，最终，乾隆五十四年《合州志》设置图考、象纬、职方、建制、食货、学校、典礼、风俗、官师、人物、选举、艺文等14类107目。在《凡例》中，还对各类纲目排列的逻辑顺序，予以说明：“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故象纬先之，职方次之，建置又次之。人不可无教养，衣食足而礼义兴，故食货次之，学校典礼又次之。端风尚者在上之责，故风俗官师又次之，人物又次之。人不一等，分途而升，故选举又次之。至于漱芳词苑，骤驰艺文，名胜奇踪，表彰始著，故艺文终焉。”^④ 其纲目的排列，符合逻辑，极具科学，体现了体例的严谨和规范。在具体的纲目中，内容涵盖更广，子目更细。以《职方》为例，下设沿革、疆域、形胜、山、岩、石、园、洞、坝、坪、江、河、峡、溪、沱、滩、磧、泉、池、古迹20个子目，而之前的乾隆十三年《合州志·地理志》，仅设置沿革、疆域、形胜、山川、石岩、井泉、沱洞、陂塘、园池、古迹、八景11个子目。两相比较，其子目进一步细化，内容更加丰富。

体裁的运用，清代后3部《合州志》，比较灵活多样。序、图、凡例、修志姓氏、目录、跋等多种体裁都得以运用（见表4）：

表4 清代《合州志》体裁

	康熙十一年	乾隆十三年	乾隆五十四年	光绪四年
序		√	√	√
图		√	√	√
叙			√	
凡例		√	√	√
修志姓氏		√	√	√
目录		√	√	√
跋		√		
小引		√	√	√

① 刘桐纂：《合州志·凡例》，乾隆十三年刻本。
② 周澄修：《合州志·凡例》，嘉庆八年刻本。
③ 周澄修：《合州志·凡例》，嘉庆八年刻本。
④ 周澄修：《合州志·凡例》，嘉庆八年刻本

乾隆十三年《合州志》重庆太守林兴泗和合州州牧刘桐为之作序，云门罗醇仁志后作跋，卷首置《凡例》，此后是编修人员和目录。乾隆五十四年续修的《合州志》，对原志的序、跋和修志姓氏先予罗列，然后，知州周澄、总修张乃孚分别作序（叙），附王汝嘉所作《凡例》，附重修人员姓氏和目录。图的使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体现对图的重视，也体现编纂者的远见，符合地方志的发展趋势。

清代《合州志》在篇前还应用“小引”这一体裁，类似于当代修志中使用的“序”或“无题序”，起到概述的作用。乾隆十三年《合州志》虽未注明，但在志中广泛使用，如在《物产志》中，卷首即言：“禹贡九州，各以土地之宜而贡万物。故金木竹石，以及禽兽包茅，罔不纪载。此物产生之所由志也。合阳川岳之生，土田之殖，凡服食器用，视全蜀无多让焉。《尚书》云，不贵异物，贱用物，则物产良非细园矣。然而享物产之利，无供亿之繁者，非我国家不殖货利之遗欤？作《物产志》。”^①乾隆五十三年续修时，王汝嘉在拟定《凡例》时，明确规定：“每卷贯小引于篇首。”^②以《职方志》为例，卷首小引概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者，三宝之首，而民政事从之。自改设郡县后，道路部省州，沿革屡矣。合邑城郭乡市与时推移，而山川形胜历古不变。裂壤分疆，星罗棋布，凡所以申画，固守劳来，而辑宁之者，何一非守土之责耶？志《职方》第三。”^③此“小引”将《职方志》的内容及相关序列予以说明，让人对内容一目了然。

四 清代《合州志》的编纂思想

清代数部《合州志》，虽历经多朝，跨度时间较长，但其编纂思想与其编纂体例具有趋同性，体现对前志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注重志书的经世致用，倡导志书要起到资政教化的作用。林兴泗在乾隆十三年《合州志序》中，阐述修志的缘由：“……其要则在表芳型，彰潜德。”“郡以邑治，邑之意，居今日而言教化，当以志乘为先务矣。”“况我朝承平百有余载，涵濡熏陶其间，伟行懿德，文人学士应运迭出，表扬阐著，以式来兹，岂容少缓哉？”^④其强调方志的教化作用溢于言表。而合州的父母官刘桐也在《序》中，阐明了修志的原因：“志何为而作也哉？古今上下之久，薄海内外之遥，天地民物之众，与夫灾祥休咎因革损益之殊，固有不能遍观而尽识，历久而不忘者，志之作于是乎起焉？”^⑤罗醇仁在《跋》中也强调了志书经世致用和教化功用：“邑之有志，非但以稽疆里，考因革，载风土典故，侈观览见闻也，实于修己治人、化民成俗之道，良有裨益焉。”^⑥周澄主政期间，续修《合州志》，其目的也很清楚：“明其识以达古今之要，诚其意以立政教之本。”^⑦通过纂修方志，达到经世致用，教化民众。另，清代几部《合州志》共同的特点之一就是人物收纳较多。在人物的选择方面，虽然存在一些封建糟粕思想，但其中也包含扬善教化之意。“孝、友、忠、义，乃人道纲维，不敢草率妄登。其节妇贞女，有公谕攸同，访闻既确，现

① 刘桐纂：《合州志》卷6《赋役志·物产志·风俗志》，乾隆十三年刻本。

② 周澄修：《合州志》，“凡例”，嘉庆八年刻本。

③ 周澄修：《合州志》卷3《职方志》，嘉庆八年刻本。

④ 刘桐纂：《合州志》，林兴泗“序”，乾隆十三年刻本。

⑤ 刘桐纂：《合州志》，刘桐“序”，乾隆十三年刻本。

⑥ 刘桐纂：《合州志》，罗醇仁“跋”，乾隆十三年刻本。

⑦ 周澄修：《合州志》，周澄“序”，嘉庆八年刻本。

拟请旌者，不妨预列简编，亦善善欲长之意也。”^① 乾隆五十三年，王汝嘉续修《合州志》时，《凡例》中规定人物的人选标准之一就是“其善行可励风俗者，登其一二以见公好之心”^②。艺文入选标准同样如此，“艺文类别，体分德行为本，文辞为末”^③。

其次，志书贵实。乾隆十三年《合州志》在凡例中，规定“志贵征实，乃可信”^④。资料和事实的真实性，为志书质量的保证。“凡厥纪载，必详明该括，俾后之览者无缺略不备之憾。”对于该志相关资料来源，编者表明，疆域、沿革、山川、名胜部分，根据邹珩十数年所收集的资料编辑的志稿，并参通志所载。对于相关资料，以存疑精神，不是直接编辑使用，而是“细加参订，广为采辑，缺者补之，讹者正之，有增无减，共成八卷。其莫可稽考者，仍为缺疑”^⑤。志书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考证，以其中的秩官为例，“前代秩官，有事可传者，载在通志。其姓名，多不可考”。因此，编者还进行实地考察，在现存的残碑遗碣、古寺梁木间得数十人，最终编为一册，对于其出身、籍贯及何年莅任不详者，不轻易下结论，采取的办法是仍然“缺之”。张乃孚作为乾隆五十四年《合州志》的主修，更是强调志书的信度。他评价历代史书，认为太史公周览天下名川，博闻洽见，“故龙门诸论传体例精严，言文旨远，后人言史，莫不昉焉”；而后世史志，“他如陈寿之志《三国》，魏收之成《魏史》，愈失愈远，又无论矣。甚或纪一事载一人辄阁笔相视，莫肯栖毫，遂至口评臆断，所说雷同，不足取信，转以滋疑”；因此，对于志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志尤史也，由是推之，知为志之难也”^⑥。因此在志书编纂过程中，访故老、觅残碑、考别集、质当时，以达“知”的目的。

最后，体例精严。清代4部《合州志》，除康熙十一年《合州志》是一部未完成手稿，残缺较多，其余3部体例规范，编纂严谨。3部志书基本严格按照《凡例》的要求予以书写，3部志书的《凡例》实际只有两则，王汝嘉修志未遂就撒手而去，但其拟定的《凡例》，得到后世的高度认可，乾隆续修总修张乃孚在序中对于前任的《凡例》褒扬甚多，续修完全照章执行，光绪四年依然沿袭。正是由于《凡例》精良，在其统帅之下，体例精严。诸志纂修，秉承“州县志详于郡，郡志详于省”的原则，在文字表达方面，认为“质胜则野，文胜则史，志傲乎史，在文质之间，无取新奇，必通雅俗，始克传后而信今”。在内容的收录方面，以《艺文志》为例，乾隆十三年规定：“《艺文志》或纪本州之事，或咏本州之景，或关乎纲常名教，不可磨灭之文，悉为采集备载。其或零星著述。或不专为本州言，或所咏叹非本州景物者，则另立《杂著》一篇示别也。”^⑦ 收录标准，只能是本地之事或景，并注重纲常伦理。乾隆五十四年收录原则，进一步弥补前志：“艺文类别，体分德行为本，文辞为末。凡典制攸系，名教所关，碑文传记，可以矜式者，悉为详载。其余则芜秽者削之，冗长者节之，后期者益之，鲁鱼乌马则考证之，要使和璧隋珠不沉于渊，燕石鱼目不混迹于肆云尔。”^⑧ 可见要求德行为标准，对于需要考证的，力求考证，精华遗漏，糟粕不能混珠。

① 刘桐纂：《合州志》，“凡例”，乾隆十三年刻本。

② 周澄修：《合州志》，“凡例”，嘉庆八年刻本。

③ 周澄修：《合州志》，“凡例”，嘉庆八年刻本。

④ 刘桐纂：《合州志》，“凡例”，乾隆十三年刻本。

⑤ 刘桐纂：《合州志》，“凡例”，嘉庆八年刻本。

⑥ 周澄修：《合州志》，张乃孚“叙”，乾隆十三年刻本。

⑦ 刘桐纂：《合州志》，“凡例”，嘉庆八年刻本。

⑧ 周澄修：《合州志》，“凡例”，嘉庆八年刻本。

结 语

清代《合州志》的纂修历程，体现我国自古以来修志优良传统。清代四修合州志，康熙十一年首开先河，乾隆十三年重修，后两次续修，历次纂修者都较好地处理了与前志之间的关系，对前志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又凸显出自身的特点。秉承详今略古的原则，避免与前志的重复，彰显“当代”风貌。在两部续修《合州志》中，以岁支为例，数据均来源于乾隆十三年《合州志》，但前志记述的内容更为详细，而续修志书中仅用寥寥数笔概括之，内容简明。在人物和艺文的记述中，这一原则也体现得非常清晰，康熙十一年《合州志》侧重于记述时间上相对较近的明代的历史人物，而重修和续修时，人物和艺文的选择更多集中于书写所在的历史时期，这也是后两部续修志书艺文和人物体量较大的原因之一。《合州志》的编纂，随着时代的更迭，体例不断完善，内容愈加丰富，可为当代志书的编纂提供借鉴，但是《合州志》编纂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首先，随着《合州志》的不断续修，志中人物比例不断扩大。志中不仅包含大量所谓的“精英”人物，同时也有很多的“平民”，对于精英人物，存在不辨疆域，滥收历史著名人物，以充乡贤光彩乡里的问题。以乾隆五十四年《合州志》为例，第10卷人物，在名贤子目中，收录李阳冰。“李阳冰，开元中为当涂令，有政绩，宗人李白常往依之，古今独步，祀乡贤。”对李阳冰的收录，估计参考雍正《四川通志》概率比较大。根据雍正《四川通志》记载，唐李阳冰，“合州人，开元中为当涂令，有政绩。宗人李白常往依之。善篆书，州治景厚堂有所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八字石刻尚存”^①。然而，对于李阳冰是否籍贯合州，显然缺乏相应考证。根据后世相关考证，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出生地存在诸多争议，并不能确证其出生地为合州。而对于“平民”的收录，秉着宣扬人道纲维的原则，烈女、节妇大量收入志中，并且所占篇幅极大。志书对于优秀女性的一些优良事迹确有记述的必要，但编纂者更多以封建伦理纲常作为判断标准，如“王贞女，受生员王开宿聘，未婚，宿病卒，王赴柩哀毁，自刎死。崇祯初，旌表入祠”^②；“丁节妇钟氏，年二十九，夫政歿，守节五十三有年，建功旌表”^③。其所宣扬的妇女守节，就有失偏颇。

其次，艺文选材标准问题。自乾隆五十四年《合州志》开始，艺文滥觞于志中。清代后两部《合州志》艺文部分均有5卷之多，涉及记、论、序、跋、疏、传、赋、铭颂、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排律、杂文、杂录17个子目。艺文内容丰富多彩，这是其优点。但是艺文在志中所占比重极大，到光绪四年，艺文比重占据全志的三分之一，这在其他志书中较为少见。艺文收录如此之多，与其《凡例》所列标准，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是背离的。从其收录的相关文献来看，不免有鱼目混杂之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雍正《四川通志》卷8《人物》（上），雍正十二年（1733）刻本。

② 周澄等纂：《合州志》卷10《人物》，嘉庆八年刻本。

③ 周澄等纂：《合州志》卷10《人物》，嘉庆八年刻本。